

主編 高興烈



历史的足音

深圳商报、深圳晚报'97新闻作品选

海天出版社

1253

G28C1

595

历史的足音

——深圳商报、深圳晚报'97新闻作品选

主 编 高兴烈
副主编 王茂亮
赵 哲
祁念曾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A0770867

前 言

1997年，我国有两件举世瞩目的大事。一件是香港回归祖国，一件是党的十五大召开。对我们报人来说，这两件大事，既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又充满了压力和考验。这一年，深圳商报和深圳晚报都交出了一份高标准的答案。

在“香港回归”的专版报道中，“回归的脚步”这一系列报道成为最精彩的战役之一。111篇独家报道，组成了既有生活广度又有历史深度的万众欢腾庆回归的壮丽画卷。1997年8月，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将这百余篇通讯定名为《回归的脚步》，公开出版发行，留下了回归历程的真实记录。

这次出版的《历史的足音》，是继《回归的脚步》之后的第二部新闻作品选。《历史的足音》是从深圳商报、深圳晚报'97新闻作品中集萃的部分篇章。“回归的脚步”百余篇专栏文章，因先前出版，这里仅选几篇代表作，以保持该书的完整性，同时也给后人留下有关香港回归的珍贵史料。

《历史的足音》，共收入110多篇新闻作品。这些作品，是广大编辑、记者一年来的劳动结晶，在写作上也颇有新意。从报道内容看，有政务报道，有经济报道，有社会新闻，都是读者关心的既有指导性又有可读性的报道。重读这些文章，使人们再开眼

界，回眸具有历史意义的1997年，字里行间，可以触摸到深圳历史的脉络，看到特区人民前进的足迹，创出的辉煌。

辛勤耕耘换来丰硕成果。1997年，对深圳商报社来说，是一个质量年，丰收年，辉煌年。回顾一年来的办报历程，主要有4条成功的作法和体会是值得总结和发扬的。

首先，要善于抓大事做大文章。香港回归祖国和党的十五大召开，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两件大事。报社编委会把宣传好这两件大事，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和系统工程，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策划，为“迎回归”和庆“十五大”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完成了两次重大事件报道的成功尝试。以香港回归为例，一是制定战役性报道计划，集中采编优势兵力，深入第一线采写独家新闻；二是动手早，行动快，提前一年半造舆论，随着“倒计时”开始，逐步加大报道力度，最后形成高潮，这是第二个特点；三是从报道内容看，既宣传了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又宣传了香港基本法，还宣传了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尤其是突出了中英两国的交接仪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四是报道形式多样化，既发评论，又辟专栏，文字照片搭配，版面语言丰富，体现时代特色，形成独家的“商报风格”。

其次，在策划上下功夫，在深度上做文章，是报道能否高出一筹的关键。对党的十五大精神系统地、准确地、成功地报道，体现了“策划”二字的重要性。这个系统工程分为会前、会中、会后三个阶段，有宏观全过程的策划，有微观分阶段的策划，有系列评论的策划，有重点报道的策划，有版面的策划，有专栏的策划。按照这个策划，会前抓了大好形势的宣传，建设成就的宣传，优秀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宣传。十五大期间，集中人力，集中版面，把会议精神及时传递到读者中去。十五大后，开辟“学习党的十五大报告”系列讲座，高扬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举办“十五大精神耀鹏城”头题新闻竞赛，推出“公有制多

种实现形式”的系列典型，并围绕“高举伟大旗帜，创造深圳辉煌”进行专题报道，把文章做在“实”字上，连续推出“务实之笔”。十五大的宣传作为一个战役，打了一个漂亮仗，打出了志气，打出了威风。实践证明，办报，离不开策划；策划，离不开创造，离不开创造性的思维，离不开创造性的劳动。办报，是一场“智慧”的较量。

其三，提高质量是报纸的立足之本、制胜之道。质量，是报纸之魂。报纸的高质量，离不开稿件的高质量、照片的高质量和版面的高质量。回顾1997年的报道，从总体上说，质量是好的，是上档次、上水平的。像深圳商报发表的查处“宝日高尔夫”偷税案的连续报道、《中华传统诗词向何处去》，深圳晚报发表的《陈桃，你好一副英雄胆》，还有7月1日深圳商报关于香港回归的版面和摄影报道《奔忙在供港“生命线”上》都分别在全省和全国获奖。当然，也有个别作品不尽人意，篇幅过长，文字较粗糙，有待今后提高。经过七年多的实践，我们已经大步迈进“品牌时代”的门槛。名牌报纸不会自天而降，要培育，要创造，要刻意为之，要苦心经营，要用“人一己百”的精神，经营好每一条新闻，每一幅照片，每一个专栏，每一个版面。

其四，重提苦练“深入采访”基本功。阅读深圳商报“回归的脚步”和深圳晚报“记者一日”专栏文章，可以使人们又一次感受到“深入”二字的分量。只有深入到艰苦的地方，深入到记者罕至的地方，才能发现“富矿”，写出“含金量”高的新闻。“回归的脚步”专栏中的百余篇报道，是记者们在“踏遍香港”的百日采访中用“铁脚板”跑出来的。深圳晚报“记者一日”专栏推出的《老知青当回新菜农》、《不能与你道“再见”》等报道，就是记者深入到农村、火葬场之后写出的“现场”新闻。这样的新闻，看起来新鲜，读起来有味，被读者称为“喜闻乐见”的精品。但毋庸讳言，时下也有一种喜欢泡会议、抄文件，东拼西凑

一篇花里胡哨的“过得去”文章。这种作风与前者格格不入。虽然是少数人、个别人，但它有碍于队伍的作风建设，有碍于报纸质量的提高。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有必要重提苦练“深入采访”的基本功。

·编者·

喜庆香港回归 共创深港繁荣

(社 论)

150 多年的岁月沧桑，几代人的苦苦期待，今天，中华民族终于迎来扬眉吐气的历史时刻——香港回归祖国了！

香港回归，是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不仅洗雪了百年耻辱，而且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日益繁荣和强大。一百多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就不可能有香港的回归。7 月 1 日零时的庄严钟声，将告慰 1840 年以来为民族的解放而流血牺牲的先烈们。

香港的回归，是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胜利，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一步。“一国两制”的构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同时，也为解决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没有新中国三代领导人的不懈努力，没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就不可能有香港的今天。

1995 年底，江泽民总书记考察深圳时特别指出，深圳经济特区除了发挥原有的作用外，还要发挥一个新的作用，就是在中

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方面发挥促进作用。这是党的重托，全国人民的厚望，是深圳人民神圣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卓有成效的工作，肩负起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

深圳与香港在历史上曾同属一个县治，深圳是内地唯一与香港接壤的城市，也是香港与内地的结合部和唯一的陆路通道。深港两地山水相连，语言相通，习俗相近。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两地人流、物流往来频繁，经济交流和合作日益密切。应该说，深圳是香港同胞了解内地，了解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窗口”；是香港联系祖国内地的桥梁和纽带。深圳 17 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为香港顺利回归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深圳今后的建设与发展，必将对香港的繁荣稳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要抓住香港回归的历史机遇，开拓进取，加强深港合作，再创深圳辉煌。

实现神圣的历史使命，必须大力推进深港经济合作。香港回归，为深港经济合作提供了新天地。深港两地社会制度不同：香港是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是经济特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今后深港合作的基础是“一国”。深港合作将会由过去民间的、分散的、短期的和由市场机制自发推动的合作，向以政府协调为助力、市场机制为基础、产业界为主体的长期全面合作转变。我们要在深港之间建立起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姐妹城”关系。

实现神圣的历史使命，必须加快深圳向现代化国际性城市进军的步伐，努力实现二次创业宏伟目标。香港回归以后，能否保持香港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发挥“内地因素”对于香港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深圳责无旁贷。我们要继续大力推进香港—深圳—内地“三点一线”发展战略，使深圳成为密切联系香港与内地的畅通无阻的经

济走廊，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最为便捷的通道，为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

实现神圣的历史使命，必须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香港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城市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香港的回归，无疑将给深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出新课题，注入新活力。深圳必须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姿态，面对机遇和挑战。深圳的改革开放程度如何，直接关系深港经济合作的水平。只有继续加大深圳深化改革的力度，提高特区对外开放的水平，才能不断为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更加良好的条件。

深港经济合作是一项带全局意义的工作，是整个内地与香港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大局利益出发，一切服从大局。凡是有利于大局的事，就坚决去做；凡是不利于大局的事，就坚决不做。

香港回归，不仅是加强深港经济合作的新机遇，也是搞好深圳市各项工作的新起点。为迎接香港回归，全市人民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开展“迎回归，创三优，争一流”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在，我们要再接再厉，扩大战果，大力推进各项工作，争做两个文明建设的排头兵，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五大的召开！

（载于7月1日一版，此文是深圳商报为庆祝香港回归而发表的社论，获’97年度深圳新闻奖一等奖，高兴烈、张学虎执笔）

九论敢闯

——纪念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五周年

本报评论员

5年前的新春时节，是深圳人民终生难忘的日子——邓小平同志亲临深圳等南方城市视察，发表了关乎国家和社会主义运动命运的重要谈话。这篇谈话科学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精辟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5年前的金秋时节，我国新长征途中树起一座新的里程碑——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全国的指导地位。以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人类社会史上首次出现了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全面结合的伟大探索。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这是对改革开放精神的高度概括，是对深圳人民的巨大激励，更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后来者的谆谆教诲。回首5年，深圳人民以“敢闯”为座右铭，牢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指示精神，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闯出了新优势，闯出了新业绩，

闯出了新天地！

5年来，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进行了市场经济十大体系的建设，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实力稳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以各种方式支援、带动“老、少、边、穷”地区，在本市实施同富裕工程，拓宽了实现共同富裕理想的途径；创造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同创建安全文明小区相结合、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同股份合作经济中的奖惩条例相结合、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相结合的成功经验。

深圳过去的成功，重要经验是敢闯；深圳未来的发展，关键仍在于继续弘扬敢闯精神。今天，深圳肩负的任务更艰巨，使命更光荣。江泽民总书记要求深圳经济特区，发挥好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作用，对内地的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促进作用；“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面对如此重托，不闯，何以肩负？

深圳要率先闯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新路，在改革和发展方面不断为全国提供新鲜经验。搞好国有企业和优化经济结构，是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攻坚战。深圳已经具备了攻坚的条件。对于搞好国有企业，政策、措施基本配套；对于优化经济结构，主攻方向业已确定，就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施“三个一批”战略。现在需要的是，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去闯，去试，去探索。

深圳要闯出在更高层次上对外开放的新路，在按国际惯例办事方面，继续发挥示范、探路作用。尤其要加强深港两地的经济合作，为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商贸中心地位，进一步发挥促进作用。从而，使深圳—香港这条国内通向国际市场的通道、中国通往世界金融的走廊，更加畅通，带动兄弟地区

不断提高利用市场资源、按国际惯例办事的水平。

深圳要率先闯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路，精神文明建设也要争当全国的排头兵。历届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并取得了好的成绩。但是，问题还存在，有的甚至很严重。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全国，对于深圳，都是全新的重大历史课题，同样需要敢闯敢试的精神，需要先行一步的举措。

重任在肩，更需要我们在思想上先闯难关，观念上先夺险隘——

要闯过权力和利益调整的难关。目前，正在展开的以全面推进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权力和利益。今后的改革也会如此。在权力和利益面前，是“屁股指挥脑袋”，还是以大局为重，深圳的各级干部在以往的岁月里，经受过多次这样的考验。任何部门的权力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由党和政府赋予的；任何人的权力，都是人民给的。当改革改到自己头上的时候，能否以大局为重，是对各级干部党性的检验，是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检验。我们相信，闯过这一关，争当“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好干部，是深圳全体干部的一致选择。

要闯过“怕得罪人”的难关。改革必然触及某些部门的利益，从而直接涉及到具体的人。道理很简单，是得罪全市几百万人民，还是得罪个别部门和个别人？是对历史负责，还是迁就现状？二者必居其一，来不得半点含糊。其实，所谓“得罪”也是暂时的。深化改革符合全体人民，包括对某些改革举措暂时有这样那样疑虑的人的根本利益。随着改革的深化，今天有些想不通的人，迟早会想得通的。

要闯过“怕担风险”的难关。邓小平同志指出：“不冒点风

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允许改革中有失误，但是不允许不改革。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耽误了国家和人民的未来，才是最大的失误，才是最大的不讲政治。“经济要发展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改革更是如此。

判断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也同样应成为思想观念上的统一价值尺度，成为发扬敢闯精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5年前的春天，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不久，本报连续发表了系列评论“八论敢闯”。今天，我们以此文为当年文章的续篇，名之为《九论敢闯》，意在以敢闯精神，与全市10万共产党员和350万人民共勉。

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敢闯的行动，以二次创业的光辉业绩，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世纪！

（载于1月25日一版，张家勇执笔）

不断推进体制创新

本报特约评论员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既是改革的过程,也是不断的体制创新过程。体制创新,就是深化改革,就是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中央要求经济特区在体制方面发挥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就是要求我们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为全国深化改革再立新功。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以来,深圳人民大胆探索,成功地建设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特区正向着文明、富裕的新目标迈进。实践证明,只有保持只争朝夕的干劲,只有不断“闯”、不断试,深圳才能不负全国人民的希望,才能在新一轮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

当前经济生活中有两大主要问题:一个是怎样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是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只有全面推进改革。

推进体制创新,必须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方面有新的突破。我们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加快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的进程,彻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提高效益是中心,转换机制是根本。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围绕建立新的经营机制进行。不转换经营机制,没有产权明晰的实践形式,没有良好的内在动力机制,没有

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切实有效的监督约束,什么样的企业都会出毛病。

推进体制创新,必须在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经济运行机制方面有新的突破。深圳在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以后,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使行政管理体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需要。要通过改革,调整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使政府的职能转到加强宏观管理、制定市场规则、实施监督管理上来。要通过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促进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创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

推进体制创新,还必须加快各种配套改革。要通过改革,建立起多层次、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依法运行、更趋完善的社会经济监督、服务体系;建立起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科技体制,完善城市功能、促进产业升级,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科技和人才条件及城市环境条件;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法规体系,使经济运行和社会管理的法制化程度达到较高水平。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相关的配套措施。

改革是一场全面的攻坚战,特别是在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后,改革更是一场相互协调的系统战。深圳要在全面改革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就必须充分利用深圳先行一步的优势,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振奋精神,解放思想,埋头苦干,发挥“试验场”作用,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探路先锋!

(载于8月1日一版)

大胆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

本报特约评论员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一论断，指明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突破的关键所在，吹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向更深层次推进改革的冲锋号角。

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有模式中，只有“一大二公”的全民所有制和被称为“二全民”的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多层次的今天，如果我们囿于已有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就会堵塞公有制发展的道路，制约甚至窒息公有制的优越性。其实，所有制性质和所有制实现形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所有制实现形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和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所有制可以采取同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同一种所有制也可以采取不同的实现形式和不同的企业制度。公有制可以而且应当采取世界上一切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营方式和企业组织形式。因此，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决摒弃“姓社”、“姓资”的干扰，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的前提下，大胆探索、创新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从而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是对我国国情作出正确判断得出的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且发展不平衡,生产社会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别,生产力的组织、管理和经营方式落后,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等等,都是这一基本国情的具体表现。过去,我们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现实,不断地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使之“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事实证明,背离基本国情,追求越来越公的所有制实现形式,不仅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相反还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就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以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根本取舍标准。

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大任务。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早就高瞻远瞩地指出:“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改革发展到今天,各种生产要素需要在更广的领域里、更高的层次上进行优化组合,客观上要求加快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步伐。另一方面,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关键是塑造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没有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激励与约束机制健全的市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便不稳固,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就成为无本之木。而公有制若找不到能够促进其生产力发展的实现形式,政企不能真正分开,资产主体仍旧“缺位”,激励与约束机制无法真正形成,市场主体就不能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从这个意义上讲,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是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的“攻坚战”。